

*Postoriental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后东方主义与 中国文化复兴

——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文化发展与战略研究

主 编 王岳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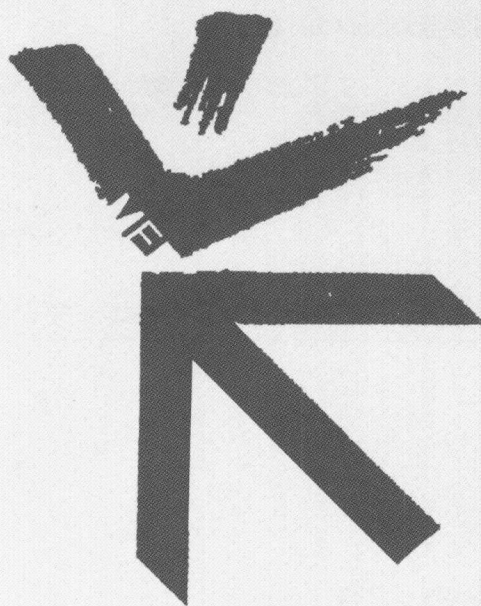
副主编 雷体沛 凌德祥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后东方主义

与中国文化复兴

*Postoriental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主 编

王岳川

副主编

雷体沛

凌德祥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
文化发展与战略研究 / 王岳川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人
民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207 - 08407 - 1

I. 后… II. 王… III. 文化事业—发展战略—研究—中
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2550 号

责任编辑:崔佳斌 孙国志

装帧设计:李 梅

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

Postoriental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文化发展与战略研究

主编 王岳川 副主编 雷体沛 凌德祥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哈尔滨市工大节能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90 000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8407 - 1 / G · 1954
定 价	43.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主 编 王岳川

副主编 雷体沛 凌德祥

撰稿者

绪 论: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胡森森,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

第一章: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第二章:田辰山,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

第三章:蹇昌槐,集美大学文学院教授

第四章:胡森森,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

第五章:凌德祥,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

第六章:王建疆,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纪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
与传播学院教授;徐 斌,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同庆,
泉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第七章:时胜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第八章:詹冬华,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第九章:曹顺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邱明丰,四川师范大
学文学院博士

第十章:金炳基,韩国国立全北大学校中语文科教授

第十一章:王 虹,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

第十二章:杨耀邦,香港商业学会、世界华人商业学会主席

第十三章:罗昌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伍时雄,北京东村创意
基地创办人

第十四章:欧阳友权,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禹建湘,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第十五章:邱紫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雷体沛,浙江工商大学人
文学院教授

第十六章:刘俐俐,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第十七章:聂付生,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第十八章:吴学军,著名经济学家

序言：后东方主义

王岳川

什么是东方主义？什么是后东方主义？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眼光和文化身份认同。前者是西方对东方文化的不平等俯视的后殖民(postcolonial)眼光,后者是用“后”(post)话语对西方俯视东方的“东方主义”贬低式的“文化训导”加以消解和颠覆,在“后东方主义”(Post Orientalism)的文化自尊和平等对话中,重新获得正当的东方文化身份和中国文化自信!

一、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

“东方主义”是西方提出来的。赛义德(Edward W. Said)在《东方主义》一书使用的 Orientalism 一词,中国学界大体译为:东方主义、东方学、东方论述、东方话语、东方学主义等,表明 Orientalism 一词的丰富性和不易把握性。《牛津英文词典》解释:“Orientalism”一词最初于 1769 年被侯霍沃特(Holdswort)用来评论荷马。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大抵产生于 16—17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时期,是西方人研究东方文化的具有俯视性的视角。1850 年至 1945 年间形成规范化知识领域,进入大学和建立学会,形成体系化制度化的研究学科。20 世纪东方学者也加入到对东方文化身份的研究中,东方学成为西方与东方共同探讨的国际性领域,但仍有文化立场文化身份的区别。

赛义德对 Orientalism 的阐释大抵有三层含义:其一, Orientalism 是指对东方历史沿革、文化演进、民族特性学术研究的学科。他认为东方学的词尾是“-ism”,不像英文的“logy”(学说、哲理)为后缀的中性化色彩,“-ism”在英语中主要指一种“主义”,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所以“东方学是一种关于东方的知识,这一知识将东方的事物放在课

堂、法庭、监狱或教科书中,以供人们仔细观察、研究、判断、约束或管制。”^①赛义德强调了东方学作为强权知识与殖民意识形态、文化霸权之间的权力话语。^②其二, Orientalism 指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建立在“the Orient”(东方)和“the Occident”(西方)二元对立基础之上有关东方的思维方式,并以此来“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mind)和命运等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社会分析和政治论说的出发点”^③。其三, Orientalism “被视为一种规范化(或东方化)的写作方式、想象方式和研究方式,受适用于东方的各种要求、视角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支配。东方学通过一些具体的方式被教学,被研究,被管理,被评判。”^④ Orientalism 具有福柯意义上的权力话语性质,即在自我与他者话语中,东西方关系被等同于“看”与“被看”的关系,这构成了东方被他者化——被西方赋予次等文化身份意味的过程。换言之,东方主义指有关世界上被称作东方的这个目前重要而具有政治紧迫性地区的意识形态上的假定、形象和幻想。

赛义德通过分析殖民宗主国怎样想象性虚构“东方”进而贬抑东方的做法,力图弄清西方权力话语的潜在运作方式,从而揭示出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在将东方“他者”化过程中的真正目的。可以说,他的写作是从社会、历史、政治、阶级、种族立场出发,去具体分析社会文本和文化文本,并构成对西方话语内部的自我批判与解构。他对东方主义研究的关键在于,弄清西方强权政治虚构或“发明”出一种虚弱的“东方”以显示“西方”优越的问题,展示“东方主义”作为西方控制东方所设定出来的政治镜像的本质。

赛义德倡导超越东西方对抗的激进立场,消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从东西方得以生成一种对话的良性发展的关系。他的思考延伸到这样一个层面:处在西方强势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保持独立性而不被西方观念所牵引?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应该怎样对全球化浪潮中的帝国主义政治社会制度加以批判?在我看来,介入政治、参与社会、强调历史,使赛义德将文学研究与政治与现实、社会与历史紧密结合起来,使《东方主义》这部“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著作成为对文化帝国主义全面清理的里程碑。

尤为重要的是,赛义德注意到,东方主义表明西方文化内部出现了多种声音,也表明西方曲解东方的企图的落空。整个东方的崛起使全球总体性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西方权力中心主义已经面临即将到来的解体和世界文化政治新格局。在这个基点上,他不赞同民族主义式的对抗西方文化霸权,而倡导通过交流对话使文化帝国主义时代走向终

① 赛义德著:《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5月版,第50页。

② 吉登斯说:“在社会科学中,不能把对权力的研究当成是次要的问题。可以说,我们不能等到社会科学中比较基本的观念都一一阐述清楚之后,再来探讨权力。没有比权力更基本的概念了。”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等译,《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0页。

③ 同注①,第4页。

④ 同注①,第258页。



结。因为，“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和化约式的类别……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就是从这下压力中寻求相对的独立。因而我把知识分子看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①我们不妨追问：赛义德是如何对东西方文化关系重新发现的？东方文明是如何成为被西方人强行扭曲改造的历史？东方作为一种被西方中心主义忽略的存在，怎样巩固了西方人的主体意识而使其变成落后民族的代言人，甚至成为诠释东方文化的合法权威？在我看来，《东方主义》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的跨学科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将研究的触角指向了东方这一向来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忽视和故意边缘化了的一个领地；赛义德憧憬消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人类远景：人类像巨大的容器，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像大海一样尽可能地容纳东西方的一切。

东方主义大体上说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在带有变色的文化侵略的西方话语看来，东方充满原始的神秘色彩。在西方的巨型想象中，“东方”成为验证西方自身文化镜像的“他者”，从而将一种“虚构的东方”形象反过来强加于东方，并在制度上、文化上、观念上将东方纳入西方中心权力结构，进而完成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既有前现代即农业社会的传统血缘关系注重亲情，同时又具有现代性的竞争、金钱和现代时间观，同时还有后现代式游戏多元人生的灰色情调。这些东西同时涌进中国，使得中国面对世界时出现了两重语境：一方面我们在学习西方现代性而西方已经走出他们的现代性；另一方面是我们总是向西方这个“先生”学习，可西方的先生老是打我们侵略我们。中国还该不该学习西方？是不是西方人走出现代性以后我们就不再进入现代性呢？是否他们打过我们，我们就不再向他们学习呢？我们能在现代性语境中拒绝学习吗？这就是今天的我们的“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问题的社会语境。

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看”、“被看”或“对看”问题，成为当代世界中文化误读和文化理解的根源。西方人是如何观看东方的，我认为有三个角度：其一，以西方为中心来“凝视”中国，凝视的眼光往往带有权力的强迫性，而被看的人具有屈辱性权力意味。凝视中国表现出西方不再是军事入侵和获取土地和财富，而是在后殖民文化、霸权文化凝视中获得文化殖民、金钱殖民、心态殖民。其二，文化拒斥，表征为这几年对西方的说“不”系列丛书（《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均有将复杂问题情绪化和对立化的倾向。甚至对外开放在民族主义高涨中变得逐渐丧失其合法性。其三，即东方学者进入第一世界学术圈后，成为西化了的东方人，并以获取的西方理论去反映自己处境的尴尬，这是东方学者进入西方后的一种文化身份。诸如赛义德、斯皮瓦克、周蕾等在西方获得了

^① 爱德华·W·赛义德著：《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6页。

博士学位并做了大学教授,但是他们却发现,自己再也不可能为印度、为巴基斯坦、为中国说话。他们的身份变得非常杂驳,必须用白人中心的话语去言说,但是又不太愿意这样言说,其身份处境颇为尴尬。

与上述话语理论相对,中国有学者提出所谓“西方主义”,即东方人眼中的想象性的“西方”。就中国而言,也有三重视界:其一,制造西方神话,追求全盘西化,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在追逐西方中制造出西方神话。其二,对西方解魅化,强调中国精神化而西方物质化。认为西方是物质的而中华民族是精神的,坚持有泱泱大国的精神文明再加上西方的物质文明,就能超过西方。其三,西方衰亡论,认为 21 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等。强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华民族几十年以后将成为世界的中心。

事实上,在经历了一个世纪中国的发展以后,不管是东方主义还是西方主义,我们也不可能实行关门主义。著名哲学家宗白华在 20 世纪 30 年代说过一句话,当时风雨如磐的神州就像一座坟墓一样,必须开窗让西方的欧风美雨吹进来,使我们文明僵化的程度减低。到了世纪末他又说:我们应该开门,让中华民族经过一个世纪西学的碰撞整合后的新文明走向国门。这提醒我们: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已经到了从鲁迅的“拿来主义”走向中国文化“输出主义”的时代了!

在超越“东方主义”精神高度上,我深切地感受到处在两套话语体制和两种语言中心夹缝中的当代学者的尴尬,我们在新世纪应该超越东方主义文化视野,应该具有一种对自身身份的冷峻认识,既不是一味地走向西方学术体制,也不是民族主义地自我膨胀,而是对着中国文化长期后殖民处境和后殖民心态有意识地加以审视和批判,从而坚定不移地走出文化失败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

二、后东方主义与发现东方

在我看来,超越于“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二元对立之上的是“后东方主义”(Post Orientalism)。我之所以提出“后东方主义”,基于以下原因:其一,赛义德东方主义并没有终结问题,相反为后东方主义留下了更多的问题,诸如:在东方主义之后真正的文化知识如何建构?个体如何对抗文化霸权?东方国家怎样才能摆脱全球化中的西方本质主义?其二,那些一味目光向内感叹地球变小为“地球村”的人,没有注意到时代已经悄悄拓展而进入“星际交流”的太空文明时代,中国精英文化应该在新世纪文化输出中有大的作为;其三,中国文化不仅是东方的,而且正在成为世界的。每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有其自身文化立场,并因而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众多思想家互动形成大国文化身份的价值认同。因此,提出“后东方主义”这一关键词,正当其时!

“后东方主义”超越了东方主义的权力话语,认为对抗东方主义而标举西方主义并没



有什么重要意义,相反,在东方主义语境中要想不坠入“殖民文化”的危险,就必须打破二元对峙的东方西方理论,以一种深宏的全球性、历史性的眼光看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从而使世界性消解民族性和现代性以及西方中心和东方中心的二元对立,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真实平等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存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互动。就此而言,任何文化压抑和意识权力强加,任何取媚西方和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在西方的价值维度和标准之下,东方文化的真实无可避免地会发生遮蔽和扭曲,同时,文化霸权的形成还依赖于东方在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心态上的“主动权”。

一个世纪的国运转换和具有强迫性的中西文化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严重质疑。这种状况使得中国文化身份充满疑问。西方的强势文化对中国而言成了必须认同的中心,这使得几乎整个 20 世纪中国的命运都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相牵扯。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说:西方仅仅将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材料,按其所需去塑造出能为西方文化解困的所谓中国文化,甚至在西方关注中国的问题上,那些论述大抵是西方话语的另一种阅读方法,而中国始终只是被观察的客体。这种在历史屈辱中成为被西方观察的“沉默他者”的地位使我们意识到,政治霸权话语以及知识殖民、符号崇拜等问题是中国文化重新定义所必要加以审视的。因为,当我们不自觉地受外来思想主宰而又不质疑其合法性时,就可能只引入一种非审视非抗衡性话语。真正健全的中国观应是对西方核心范畴进行剖析,并在这种接纳和质疑中生成自我的新文化。

今天,这种“作为处理材料的中国”以验证西方理论的做法已然过时,似乎可转向“作为方法的中国”^①——中国知识话语本身形成一套方法,不需要借用西方方法,而只需用中国的方法将研究对象主体化。我认为应该提出“作为主体间性的中国”甚至“作为他者间性的中国”,使“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之争”让位于“人类性”共建共存问题,在人文视野和世界主义的广阔精神下,使发现东方文化精神和发现西方文化精神成为发现人类文化精神的生态和谐的过程。然而,对中国知识界而言,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知识分子该如何面对一个真实的中国?近代以来,中国的许多举动和措施都是对西方的一种回应,并常常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在急于将文化、政治、经济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中国无可避免地被笼罩在了后殖民主义世界的大气候之下。

经过了改革开放 30 年的中国经验,中国思想界明白了:中国思想文化界不能一味跟随西方现代后现代的标新立异的文化走,“守正创新”是自身文化生命精神正脉的坚守与提升,而“文化原创”是文化生产力大幅提升的标志。只有守正创新和坚持文化原创,才

^① 沟口雄三著:《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9 年版,第 131 ~ 140 页。

能打破妖魔化而向世界呈现大国文化美好形象。文化输出意味着大国文化真正崛起,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整体性地守正创新。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感受方式。东方文化形态成为东西方互动的人类文化形态,将是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达到和谐协调的人类福音!

当今世界是一个正在全球化的世界。世界新秩序不仅重新组合全球性的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正在取代以前的民族国家体制中的话语运作结构,这一切都造成了世界各国知识分子在问题意识、自我身份、知识价值定位等方面的新的时代氛围,也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对全球化作出各自不同的反应。这种从巨型社会文化意识的形态分析到微型文化传播消费意识的形态转化,使问题有可能得到真实的显露。我们不能老依赖现代西方、靠知识输血来振兴自己的文化,而要有本土文化精神的新增长点。文化创造性是新世纪中国学人思想的焦点所在——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我们的文化都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况下,要化挨打为创造,化文化拿来主义为文化输出主义,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当然,大国崛起中的新思想新观念的广度和传播的广度决定学者在“学术文化链”上的位置。思想需要不断转化型创新才能使我们在世界学术文化链中获得高势位。在我看来,中国历史尤其是百年中国史不断惊人地反复出现某些现象,除了国运的衰微以外,还与中国的“极性思维”有重要关系。换言之,是由于丧失了文化的累积性建设,因而总是徘徊在激进与保守、自由与民主、现代与前现代、中国与西方二者之间,总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排斥多元开放的兼容模式,以一种狭隘心态去做激进乌托邦式的表演,没能获得思想文化史的资源共享和真正的学术推进。这主要表征为,在思维上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两个极端的频繁跳动、一次次非此即彼的“极性思维”,导致中国学术文化经验在一代又一代中断裂,总是不可通约交流,不可传递增长,每一代人总是从空白开始去获取自己的经验,然而又重新抛弃这种经验,历史就这样一代代地荒疏和空洞下去。而在价值观上,则总是以一种暴力对抗另一种暴力,将体制的更迭变成思想的殊死搏斗,甚至不惜从肉体上消灭对手。这种状况导致了思想的反复中断,反复转圈,反复地无效劳作。面对20世纪中国问题,不难看到,多少有建设性的思想、有学术启发性的结论,在不断的言述中消失了的真正思想火花。

本书是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学者策划的一次成功的国际会议的成果——通过多国学者对金融危机的快速反应举办的高端论坛,呈现出近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变迁的踪迹:无论是从中国文化复兴和文化输出上看新世纪世界文化走向还是从经济上清理跨国资本运作与文化霸权的关系,无论是从中国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的重新确立还是从避免文化战争而强调太空时代的三和文明,无论是从媒体发展上看数码复制时代的大众文化平面化还是从文化产业考察中看全球化是否存在“世界文化”来临或使全球文化碎片化,

都能发现新视角和新问题。可以说,全书各章凝聚着前沿学者的最新思考,学者们尽可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发现问题,触及当代学术复杂性和前沿性,体现出中国崛起中的大国文化安全意识、家园意识和人类资源共享意识。这正是知识分子的文化根基和情怀所在,也是超越可赛义德“东方主义”之后的“后东方主义”中国文化战略的重中之重——守正创新与文化输出!

最后,感谢各位学者能够提供高水平的文稿,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们,他们辛勤的劳动,使得本书得以尽快面世。

是为序。

2009年4月16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 言：后东方主义 王岳川(1)

绪 论 (1)

一、全球化时代文化范式转向和文化战略问题之来由 (2)

二、文化战略研究领域的学术拓展 (4)

三、文化战略研究的理论话语与入思角度 (7)

四、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战略与人文失语症候 (11)

五、全球化与中国文化战略问题凸显 (17)

六、文化创新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和正大气象 (23)

上编 大国崛起与文化输出

第一章 西方金融危机与新世纪中国文化复兴 (31)

一、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世界大势 (32)

二、大国和平崛起与全球“国家形象”中的地位 (36)

三、中国“三和文明”应同西方“三争文明”互补 (40)

四、注重软硬实力与中国可持续“文化输出” (43)

五、重新评估“美国精神”与“中国精神”世界化 (47)

六、中国“精神现代化”与“国家文化安全” (49)

七、“再中国化”的关键在于“走近经典”与“文化复兴” (51)

八、后冷战时期国家文化安全的“十大关系” (54)

九、新世纪中国文化自觉与文化战略 (65)

十、太空文明时代与中国文化原创力提升 (68)

第二章 大国地位与中国文化身份确认 (75)

一、文化认同与文化信心 (75)

二、“中国文化在世界中的身份地位”问题的由来与意义	(76)
三、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与差异	(76)
四、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身份地位从何而来	(79)
五、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和全球文化	(80)
六、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措施	(83)
第三章 世界秩序的重建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85)
一、重解伟大的精神传统	(85)
二、重塑民族的文化身份	(88)
三、重构多元的话语体系	(91)
第四章 文化政治学观照下的当代文化新趋势	(94)
一、文化政治学的介入	(94)
二、文化研究方兴未艾	(97)
三、艺术价值终结与文学价值凸显	(103)
四、文化保守主义复兴：文化能否超越政治？	(107)
五、乌托邦意识的幻灭与重建	(112)
第五章 全球金融危机下话语权及教育权研究	(123)
一、金融危机及英语全球化背景下国民话语权问题	(123)
二、汉语母语教育权	(128)
三、语言的兴衰更替	(131)
四、汉语话语权与教育权是国家与民族的最高战略	(134)
第六章 “全球化”中的文化输出与价值重审	(139)
一、反思“全球化”与“化全球”的神话	(139)
二、中国强势力量与文化输出的现实性	(144)
三、当前文化困境及文化价值的重审	(147)
四、普世价值和中国当代文化发展	(150)

中编 中国形象与文化立场

第七章 “文化立国”与中国的文化立场	(159)
一、当代世界观转型的文化语境	(159)
二、世界主义的文化世界观	(163)

三、从全球化到世界化	(167)
四、世界主义的文化追求与价值实践	(172)
五、文化立国与国家战略	(173)
六、文化创新的当代意向与价值立场	(176)
第八章 新世纪中国文化创新的时间逻辑	(181)
一、在“文一化”的绵延中理解“文化”	(182)
二、中国文化创新的三个时间陷阱	(184)
三、随时而中：中国文化创新的时间逻辑	(189)
第九章 中国古代文论的西化历程	(196)
一、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与西学范式的关系	(197)
二、古代文论的当代生存样态遭遇西方化进程	(205)
第十章 21 世纪世界文化新论题：汉字与书法	(212)
一、泡沫金融危机，泡沫文化危机	(212)
二、借汉字文化圈文化净化世界文化	(214)
三、韩国社会对于汉字的认识与汉字教育强化的必要性	(216)
第十一章 中日两国文化的认同与发展	(223)
一、日本对中国文化认同的断层	(225)
二、新时期中日两国文化碰撞的现状	(231)
三、新时期两国文化意识冲突的主要原因	(236)
四、中日两国文化认同的走向	(239)
五、21 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课题	(244)
六、中国走向世界并让世界认同中国	(247)
第十二章 从奥运会语文沟通看大国文化立场	(249)
一、北京奥运强调一个中国和而不同持续创新的理念	(249)
二、奥运文化的多元宣示、多极外交、绿色环保	(251)

下编 文化身份与文化战略

第十三章 文化产业在反金融危机中崛起	(257)
一、金融危机冲击下渐趋萧条的世界文化产业	(257)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文化产业崛起的历史经验	(259)

三、中国文化产业化危机逆势上扬的契机	(260)
四、经济危机与构建创意产业区的基本战略	(263)
第十四章 中国文化品牌发展现状与对策	(268)
一、中国文化品牌的特征	(268)
二、中国文化品牌构建的主要问题	(271)
三、提升中国文化品牌的对策思考	(274)
第十五章 后现代哲学透视当下中国大众文化	(276)
一、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的山寨文化现象	(276)
二、后现代主义与文化消费的商品性质	(278)
三、对大众文化的深层价值解读	(281)
四、大众文化的过度消费和过度的狂欢化	(284)
第十六章 “美人之美”:多民族文化的战略选择	(288)
一、“美人之美”问题的提出	(288)
二、民族文学理论中蕴涵的丰富思想资源	(289)
三、民族文学文本特性及其诗性智慧的当代意义	(291)
四、民族文学的文化认同及其珍贵价值	(295)
五、“美人之美”是一种需要建构的姿态	(298)
第十七章 瓯剧改编本《张协状元》的文化产业启示	(302)
一、戏剧遗产的整理	(302)
二、戏剧艺术的活化石:唱腔	(305)
三、戏剧传统的传承与创新	(308)
第十八章 从世界金融危机中憧憬中国未来	(312)
一、金融危机是由于美国金融领域几个环节出现问题	(312)
二、金融危机实质是资本的贪婪和消费主义泛滥的结果	(315)
三、中国发展战略的选择	(319)
附录 “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国际高峰论坛”纪要	(323)

绪论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和多极化并存的世界。世界新秩序不仅重新组合全球性的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正在取代以前民族国家体制中的话语运作结构。这一切都造成了世界各国知识分子在问题意识、自我身份、知识价值定位等方面的新的时代氛围,也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对全球化作出各自不同的反应。

我们不能老依赖现代西方靠知识输血来振兴自己的文化,而要有本土文化精神的新生长点。文化创造性是新世纪中国学人的思想的焦点所在——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我们的文化都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况下,要化挨打为创造,化文化拿来主义为文化输出主义,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思想需要不断转化型创新。在我看来,中国历史尤其是百年中国史不断惊人地反复出现某些现象,除了国运的衰微以外,还与中国的“极性思维”有重要关系,换言之,丧失了文化的累积性建设,而总是徘徊在激进与保守、自由与民主、现代与前现代、中国与西方二者之间,总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排斥多元开放的兼容模式,以一种狭隘心态去做激进乌托邦式的表演,因此无法获得思想文化史的资源共享和真正的学术推进。这主要表征为,在思维上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两个极端的频繁跳动,一次次非此即彼的“极性思维”,导致中国学术文化经验在一代又一代中断裂,总是不可通约交流,不可传递增长,每一代人总是从空白开始去获取自己的经验,然而又重新抛弃这种经验,历史就这样一代代地荒疏和空洞下去。而在价值观上,则总是以一种暴力对抗另一种暴力,将体制的更迭变成思想的殊死搏斗,甚至不惜从肉体上消灭对手。这种状况导致了思想的反复中断、反复转圈、反复地无效劳作。面对20世纪中国问题不难看到,多少有建设性的问题、有学术启发性的结论,在不断的言述中消失了的真正思想火花。

当然,大国崛起中的新思想新观念的含量和传播的广度决定学者在“学术文化链”

上的位置。那些原创性的思想家生产了一个时代,而其他人却仅仅在消费他们的思想,甚至淡化消泯他们的思想成果。当新时代需要新的阐释时,全球学术话语“文化链”一端的波动,会使得处于另一端的我们措手不及。我们思想的命脉与西方“他者”紧密相关,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也是一个急需改变和超越的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

一、全球化时代文化范式转向和文化战略问题之来由

任何理论首先需要回答的是自我本体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之前为什么别人没有能提出类似的理论,为什么这一理论偏偏要诞生于此而非另一时代?每一个哲学家、思想家则首先必须面对自己的时代,无论其对于所处的时代是赞扬还是诅咒,其本人无可逃遁的命运在于:只能立足在这个时空点上发言和思想。一种哲学、理论和思潮无不烙下了时代的鲜明痕迹,甚至大多数思想和写作的人们都有一种自觉的时代意识,即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独一无二”的。

回顾人类的哲学史和思想史,能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黑格尔从马背上的拿破仑身上看到“世界精神”,从而创立恢弘的辩证法体系;康德曾为自己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同时代人感到骄傲;马克思对于工人运动兴起的准确把握以及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预言,隐含着对自己时代的高度自信;尼采揭开苏格拉底以降的哲学骗局,公开宣告了一个上帝死亡时代的到来;利奥塔关于后现代知识的报告敏锐地发觉了“宏大叙事”消解的现实;福柯对权力“话语”的窥视,萨义德对“东方”的审视,德里达对“逻各斯”的质疑……在这些思想家的内心深处,都隐含着一种鲜明的“时代感”——认为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是无法替代的人类历史转折点,是旧时代的终结或新时代的滥觞,在这个时代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其他时代所没有、无法面对或难以解决的新“现象”。^①

这种时代感并非思想者的局限性,这种自信不断被超越、颠覆却又一代代延续着重新书写,其中隐含着的问题恰恰在于:一代知识分子应该也只能面对属于自己生活着的这个世界的特殊性。因此,恢弘庞大的哲学大厦和璀璨万分的思想宝库,所提供

^① 西方学术语境下产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毫不奇怪,追溯到黑格尔那里,他甚至认为1806年拿破仑与普鲁士的耶拿战役之后,历史已经走到了尽头;东方代表开端而西方意味着终结,线性历史观映射下的东方自然成了停滞和重复的代表,同不断走向新的“终结”的西方形成了鲜明对比,福山本人就自觉意识到了黑格尔的重要性,认为“黑格尔是最先严肃处理印度、中国等欧洲以外‘不同人民之国民史’的欧洲哲学家之一”,遥远的中国被黑格尔描述为“没有时间只有空间”的国度,显示出欧洲哲学家鲜明的“时空本位”立场。参见周宁著《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1页。